



海派文化不仅“洋派”而且“会通”

——李天纲教授在徐家汇源景区的演讲

思想者小传



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,著有《金泽:江南民间祭祀探源》《跨文化诠释:经学与神学的相遇》《中国礼仪之争:历史、文献和意义》《文化上海》《人文上海》《南京路: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》,主编《徐光启全集》,编辑《马相伯集》等,曾获“徐光启奖”(中国香港,2001年)、“利玛窦奖”(意大利,2018年)。

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。

提到海派文化,人们常常会联想到“时尚”“洋派”。但与此同时,坊间对于海派文化也存在不少误解。比如,以为海派文化“崇洋媚外”,似乎是靠了晚近的西方化才出名的,并没有什么根基。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。

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整个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都非常发达,上海也不例外。当然,上海有一点比较特别,那就是在400年间西洋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,确实承担了一个“桥头堡”的作用,领“西学东渐”之先。

在海派文化的发展过程中,前后有两个上海人可以作为代表:一个是明末的徐光启,另一个是出生于清末的马相伯。

这两位思想家、学问家和政治家,都是在江南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,但同时具有贯通中西的禀赋,而且都和徐家汇有着密切关系。概括来说,徐光启、马相伯都是精通旧学的传统士大夫,却又领导了明末清初、清末民初的西学运动。

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开放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机缘巧合,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,继而逐渐演变成独特的海派文化。

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“思想汇”栏目
栏目主编王珍邮箱:shhgcsxh@163.com

无论赞同还是批评“洋派”都不应该片面讲

常听到有人说,海派文化很“洋派”。言下之意,海派文化似乎靠了西方化才出名。过去,也有人试图将海派文化污名化,说它是“洋场文化”。那么,事实到底是怎样的?

“海派”确实与西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。我曾经把开埠以后的上海文化划分成两个阶段:一个是初期由外侨主导的“维多利亚时代”文化,那是引进为主;另一个是上世纪30年代的“海派文化”,那是华洋一体,以本土创新为主。

我认为,无论赞同还是批评“洋派”,都不能片面讲。海派文化和传统文化、江南文化并不冲突,反而有着更深的渊源。还有很多人误会上海历史,说这里的文化没有什么根基,全靠“西方

化”,是“洋泾浜”,这些都是不对的。

上海文化有深厚的传统,深到什么程度,当然和历史有关。上海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呢?1991年,几位上海史研究的前辈学者,如唐振常、吴云甫、施宜圆、周振鹤等先生,以及我们几个当时的年轻人,一起讨论上海的历史到底怎么算?当时确定了1292年,元至元二十九年,“上海镇”变成“上海县”,为“建城七百年”。

“七百年”的城市已经是美国建国历史的三倍了,但与苏州、南京、杭州、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北京等古城相比不算很久。然而,一个地方的文化渊源,通常都早过它的行政建制。没有上海县的时候,本地区的文化其实也已相当发达了。

仅就儒、道、佛学的影响来看,宋元时代上海地区已是“南方之强”,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鼎盛。例如,金泽镇在宋代已经极盛,镇上的颐浩寺香火甚至超过杭州灵隐寺;朱家角镇在明清时期有万户人家,出了几十个进士,比某些地方的一府一省还要多。

江南文化源远流长、人文荟萃,也许不用多说。但有一点需要辨析,即在海派文化还没有成形的时候,明清时期就已有一股强劲的西方文化汇入。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前,就以传播西学而闻名江南,这为以后海派学术的兴起作出了重要铺垫。

明末清初,上海在江南地区出类拔萃,是外

来文化的“输入地”。上海徐家、乔家、潘家以及华亭许家、嘉定孙家,都传习西学。

一般以为,上海是在1843年开埠后才成为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,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。明万历年间,上海就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,如董其昌、陈继儒、陈子龙等,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讲的徐光启。徐光启这位入籍徐家汇的先贤,使上海在明代就成为当时文化开放的中心。

鸦片战争爆发前200多年,被称为“徐上海”“徐闻老”的徐光启,就已经是一位翻译先驱、西学泰斗。同时,他还是文渊阁大学士,实学(经学)同样一流,堪称表率全国。在徐光启那里,西学和经学是可以相互补充的。

两个“徐家汇人”勾勒出上海文化开放轨迹

让欧洲的天文、历法变得先进了。

欧洲中世纪的历法曾比中国落后,汉代、唐代、宋代、元代的历法都曾好过欧洲。但到了明代,《大统历》就不及欧洲了。于是,徐光启、利玛窦决定翻译《几何原本》,编著《崇祯历书》。1644年,清朝人把它改名为《西洋新历》,基本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。

徐光启能够翻译这些著作,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和利玛窦是朋友。我喜欢称他俩是“搭档”,是指两人相互学习、交流对话的师徒关系。

在徐家汇天主堂、土山湾博物馆,17世纪以后的欧洲各种文字著作中,都有利玛窦、徐光启两人并列的画像。1672年,在基歇尔的《中国图说》中,第一次出现《利徐谈道图》。画中的两个人,一样高低,列在两侧,表明两人地位是平等的;画面是巴洛克式的结构,对称、平衡、反复。

利玛窦曾向徐光启请教中国的学问,并把儒家经典翻译到欧洲。“四书”中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,都由利玛窦翻译成了拉丁文。

他们的同道后学金尼阁写了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,对中国文化更是有许多溢美之词。如“地大物博”“礼仪之邦”“四千年文明”等,最初都出

现在这本书里。这些都是他们宣扬出去,再传回中国的。

利玛窦还说:中国3000年前就有造纸术,有了书籍,而欧洲在15世纪才有了古登堡印刷术;还强调,中国的历史记载从周代以后就没有中断、长期延续、至今不绝,等等。

马相伯更是一个有意思的代表性人物。如果说徐光启在明末为中国奠定了西学基础,那马相伯则在清末继续往开来,为海派文化注入了19世纪、20世纪新的西学。

马相伯原名建常,江苏丹阳县人。1851年,他从家乡来到上海,入徐家汇依纳爵公学(后改名徐汇公学),成为“新上海人”。此后,在徐家汇、土山湾住了大半辈子,参与筹建徐家汇天文台、气象台、博物馆、藏书楼等,可谓典型的“徐家汇人”。1876年,他还参加了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。

马相伯懂七八种文字,如希腊文、拉丁文、法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朝鲜文、日文。在19世纪的中国,马相伯算得上是懂外语最多的人。

章大炎是国学家,尤为看不起“买办学问”,但他认可四位西学家:严马辜伍——严复、马相

伯、辜鸿铭、伍廷芳。一般是留洋学外语,马相伯没出国就学会了多国语言,可见当时徐家汇的文化和学习氛围之好。

马相伯的老师叫魏德菴,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。他用拉丁文翻译“四书五经”、诸子百家,编成《中国文学教程》。他当徐汇公学校长的时候,搭档就是马相伯。

马相伯的眼光和能力也值得讲一讲。他曾经在戊戌变法高潮中,通过梁启超说服清朝在徐家汇设立“译书局”。晚年时光,主要从事翻译——《新史合编直讲》是其翻译的;《致知浅说》是介绍欧洲经院哲学;《拉丁文通》是用来教梁启超、麦孟华、蔡元培、张元济、于右任、黄炎培的教材。

徐光启、马相伯的治学轨迹,勾勒出400年来上海文化开放的轨迹。从中,我们可以看到江南文化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困境、步入现代的。

这两个“徐家汇人”,中学造诣之好自不必多说;可贵的是,他们还能力排众议,学习自己并不熟悉的西学。同时,他们的学问和人格都很完整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品格,上海才能海纳百川、中西汇通,海派文化才能成就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。

“翻译、会通、超胜”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段

上海是最早传播外来文化的地方。如果说海派文化也包括科学、哲学、艺术、教育等内容,或者说确实有一种海派学术的话,那徐家汇当然是最重要的渊源之一。徐光启、马相伯等本乡先贤,可以说是海派学术的肇端与始创。

1619年,利玛窦的学生金尼阁从欧洲回来,带来“西书七千部”。徐光启闻讯,立即奏请朝廷开译书局,在江南地区翻译、刊刻西方著作。久议不决之下,徐光启就自己动手翻译,还自筹资金在民间刊刻。

一些中国哲学史论著提出,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奥古斯丁著作的翻译是20世纪开始的,晚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在大学里讲授经院哲学、古希腊哲学。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
明朝的时候,徐光启就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《论灵魂》。徐光启不懂拉丁文,但他有一个助手毕方济,之前在南京作研究,后来跑到上海跟他一起翻译。

徐光启研究中世纪哲学,提到“四因说”,即质料因、形式因、动力因、目的因。他把“四因说”翻译成“四所以然”,是知其所以然(原因)的意思。

徐光启还把人类经验形而上学化,归结成对真理和本体的讨论,并启用来明理学,即朱熹、王阳明的概念,来翻译西方哲学。这比今天一些“白开水”似的寡淡翻译有意思得多了。

在松江,还有一个传教士叫柏应理,是徐光启家族供奉的耶稣会士。柏应理写了一本书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,第一次完整地向欧洲人介绍孔子和儒家。所以说,上海人喜欢西洋文化,但并不为外国人所驱使。相反,我们是出钱请人来做事的。

19世纪、20世纪的徐家汇,进一步成为海派学术的重镇。1876年,耶稣会决定放弃北京,不再谋求获取“内廷供奉”的机会,转而一心在上海从事精英文学研究,因此启动了规模庞大

的“江南科学计划”。

伴随这一计划,徐家汇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式中等教育学校——徐汇公学、第一座西式图书馆——徐家汇藏书楼、第一座博物馆——震旦博物院、第一座天文台——徐家汇天文台、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——汉学研究所,等等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由马相伯在徐家汇地区创建的震旦学院、复旦公学,也是“江南科学计划”的产物或者说延续性成果。徐家汇地区的科学、教育、文化和学术机构,都成为海派学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从徐光启生活的明末到马相伯生活的19世纪,海派文化中确实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内容注入。徐家汇是上海地区精英文化发端的一个重要渊源,主要提供的是教、科、文、卫高端学术,其文脉传承至今仍然清晰可辨。

坦率地讲,徐光启、马相伯研究西学,“崇洋”是有的。毕竟,当时西方的科学、哲学、文化、艺

术、技术确实比较先进,比清朝的八股文章要好得多。但说他们“媚外”,是没有真正根据的。看看徐光启、马相伯的生平,哪有一点媚骨,何曾讨外国人的营生?

他们是实事求是、学习先进、服从真理,并不是单单传播外来文化,而是把外来文化和传统学术交融,各取所长之后融会贯通,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,演变成了海派文化。

徐光启在写于1631年的《历书总目表》中说:“欲求超胜,必须会通;会通之前,先须翻译。”要超过西学,就必须好好学习;学习之前,首先还要翻译。

“翻译”“会通”“超胜”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段。“超胜”,并不是要把西学踩在脚下,海派文化的创新逻辑不是这样的。徐光启的“超胜”,是一种创新,意味着创造出一种“新文化”,作出新贡献。这是400年来上海文化的大格局、大抱负、大目标。

可回收垃圾中的丰富资源,你知道吗?

1吨废玻璃 可生产2千个1斤装的酒瓶

1吨废纸 可节省300公斤木材
少砍12-17棵大树

1吨废塑料 可节省6吨石油

1吨易拉罐 可生成1吨很好的铝块
可少采20吨铝矿

1吨旧衣服 可生产0.99吨无纺布
或分色棉纱
可节约1.1吨纺织原料
或0.8吨棉花

垃圾有分类,回收不浪费

垃圾分类小知识 可回收垃圾篇

在上海,市民生活所产生的可回收垃圾每年约有200万吨之多,一旦被湿垃圾、有害垃圾等污染后,回收利用价值就会急剧降低。让我们动动手,勤分类,从源头开始为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出一份力。

解放日报文化传播中心